

扎根人民的创作实践与为奋斗者画像

葛·呼和少布

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,文艺创作承担着记录时代、塑造精神的重要使命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、一千条,但最根本、最关键、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、扎根生活。这一论断揭示了文艺创作与人民生活的本质联系。

套色版画《暖冬》是版画家陈晚燕的一幅作品,她于2024年年末被国家民族画院聘为画家(研究员)。该画尺寸是107cm×76cm,以黑白灰为骨、明黄为魂,定格于在风雪街头骑着电动车努力向前的快递小哥。画面里,飞白线条织就漫天寒雪,秃柳的枝桠在寒风中抖着雪花,积雪的路面皴裂出纹路,连停靠在的车辆都蒙着积雪,冰冷从肌理中渗透出来。而穿行在风雪中的快递员,头盔凝着冰雪、衣襟中夹着雪花,唯独明黄的工装在冰雪寒天中闪亮。电动车后座上的快递箱勒得非常紧实,车轮碾过的雪痕里刻下了奋进的执着。画家以版画的粗犷,锚定“平凡暖意”的内核,用黑白灰铺陈冬日的凛冽,以飞白线条摹写风雪的凌厉,让墨块堆叠出街景的冷寂,使风雪的冰冷成为底色,再以孤注一掷的明黄揉进了生活的温度,在黑灰里突围。这抹被风载雪的明黄,正把“暖”送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这不是冬日的个例,是平凡人托举平凡的日子,奋斗者努力拼搏的画像。正是这样的一个个奋斗者在生计的褶皱里,在庸常的日子里,默不作声地挺起了坚强的脊梁。

绘画属于静态艺术,主要体现为色彩的同时对比。同时对比指两个或多个颜色并列,彼此影响,改变各自的特征。快递员的明黄色服装,在黑灰中看起来更亮、更饱和、更温暖。奋斗者的形象也更凸显,更生动。通常,人们认为奋斗者的形象应该是高大上。其实,任何不服从于命运的胁迫、不向困难低头、积极向上的人都是奋斗者。从这幅画不难看出画家正是通过扎根人民的创作实践,践行着为奋斗者画像的宗旨,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,为人民而创作。

在价值多元、信息爆炸的当代社会,奋斗精神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,正面临被稀释、被误解的风险。为奋斗者画像,不仅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礼赞,更是对时代精神的凝练与传承。这一创作实践具有深刻的时代必要性,它通过具象化表达凝聚社会共识,激发公众共鸣,并在历史长河中刻下民族精神的鲜活注脚。

当消费主义浪潮裹挟着“躺平”“佛系”等思潮冲击社会价值观时,奋斗精神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部分青年群体将奋斗误解为“内卷”,将成功简化为物质积累,这种认知偏差导致社会对奋斗者的认同感逐渐弱化。例如,某高校调查显示,超过60%的受访者认为“努力与回报不成正比”,这种心态折射出奋斗价值的认知危机。为奋斗者画像,为奋斗者讴歌,正是通过艺术化手段重构奋斗的价值维度,这也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担当。

新时代奋斗者精神的核心是主体性的觉醒,奋斗者应该成为学习的榜样、文艺创作的主体。以“敦煌女儿”樊锦诗为例,这位扎根大漠数十年的文物保护者,用一生诠释了“择一事终一生”的坚守。她面对城市繁华与荒漠孤烟的抉择时,她并未盲从于浮躁和虚荣,而是用扎根理想的实际行动回应了“奋斗是否值得”的质疑,更以“文化守护者”的标签,为奋斗赋予了超越物质的精神意义。2020年,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“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”栏目中写给樊锦诗的颁奖词称——“舍半生,给茫茫大漠。从未名湖到莫高窟,守住前辈的火,开辟明天的路。半个世纪的风沙,不是谁都能经得起吹打。一腔爱,一洞画,一场文化苦旅,从青春到白发。心归处,是敦煌。”

扎根人民的创作实践始于对生活的深度观察,需要文艺创作者深入文化根脉。其实践意义具有独特的审美教育功能,这种功能突破了传统美育的单向传播,建立了双向互动机制。为新时代奋斗者画像不但要突破英雄叙事的宏大框架,还应转向微观视角的深度刻画,让奋斗者形象建构完成从个体到群体的升华。为奋斗者画像还需突破传统审美范式,注重表现创新的辩证关系,让时代精神的表达构建集体记忆,促进文化认同,实现奋斗精神的代际传承,在传承中完成创新。

扎根人民的创作实践与为奋斗者画像,构成了新时代文艺创作的双重维度。前者解决了“为谁创作”的问题,后者回答了“创作什么”的命题。通过生活体验的深度化、文化根脉的现代化、技术赋能的创新化,文艺创作实现了从“反映现实”到“建构现实”的跨越。奋斗者形象的塑造,不仅记录了时代进程,更通过审美表达激发了民族精神。这种创作实践将发挥凝聚人心、引领风尚的重要作用。

佳作鉴赏

家乡的布鲁

董贵

每当看到身着蒙古服饰的小伙子们投掷布鲁,演绎着激情与速度的交响曲时,都会由衷地为我们是布鲁的故乡而感到骄傲。一个仅有十几万人口的库伦旗能够让布鲁文化传承发扬光大,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荣耀。

布鲁是蒙古族特殊的体育竞技项目。在内蒙古自治区举行的第一次那达慕大会上设项,因为当时没有统一规格的布鲁,来自全国各地的70多个选手拿着各自的布鲁参赛。经组委会反复比较试验,最后将库伦旗选手嘎扎带去的用榆木做的布鲁确定为比赛专用布鲁。嘎扎也不负众望,以99.85米的成绩一举夺冠,并被聘请到内蒙古大学为大学生讲授布鲁投掷的方法和技巧,从此库伦旗成为布鲁的发祥地,被称为布鲁之乡。时隔二十五年之后,嘎扎的儿子打破了父亲的纪录,成为新一代的布鲁冠军,留下了“父子冠军”的佳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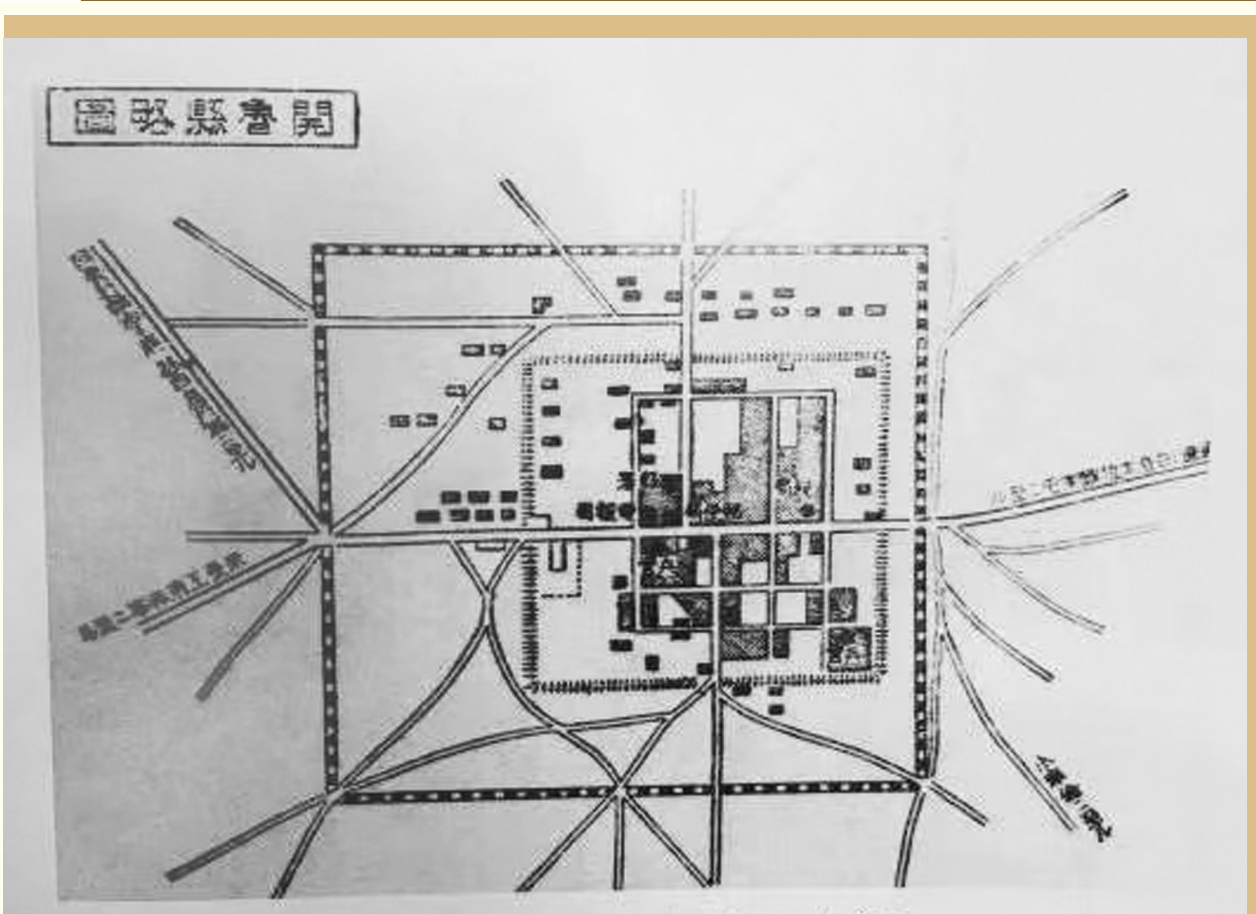
布鲁很早就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布鲁的形状像一把镰刀,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00多年前,那时的人们将其作为狩猎工具和御敌武器来使用。牧人们人手一个用于驱赶跑散的牛羊,也用于捕捉野兔野鸡等猎物,俗称托来(蒙古语兔子的意思)棒子。用的材料各不相同,基本取材于本地特有的柳树、榆树、枣树等硬杂木为主。人们把棒子打磨得光滑美观,有的涂上颜色,有的在棒子前面包上金属箍或者坠上一个铁疙瘩,使用起来威力更大,运气好时还能打到一些野味,也可以防止野兽伤害牲畜。

玩惯布鲁的蒙古族人们经常在闲暇之余聚在一起,载歌载舞,大碗喝酒,大块吃肉,然后举行布鲁比赛,看谁投掷得远,看谁投掷得准,胜利的一方会得到无数的笑脸和赞誉,也会得到姑娘们的青睐。在精神生活相对单调的草原上,掷布鲁成了传统的娱乐项目,能手层出不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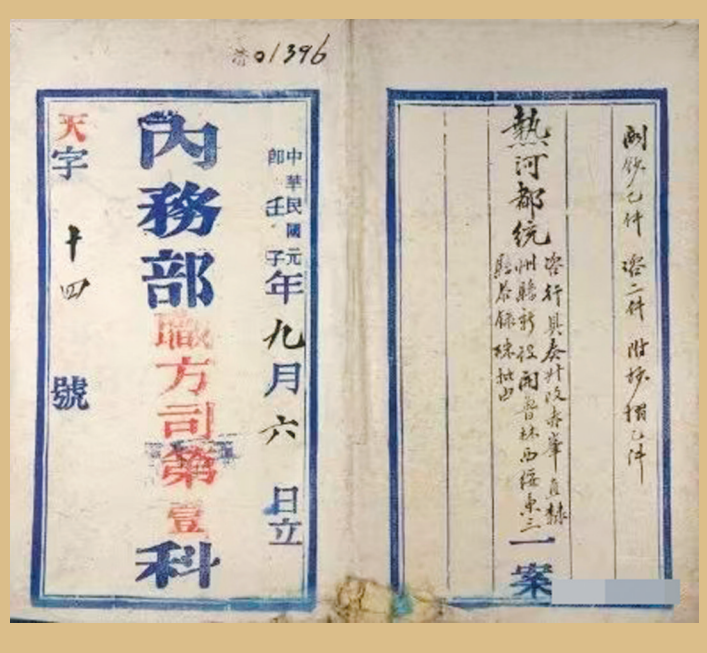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布鲁项目的传承发展,标准的布鲁开始批量生产,经过特殊加工压制而成的布鲁材质更合理,使用起来更加顺手,大大地提高了比赛的成绩和观赏性,在内蒙古大、中、小学体育课上得以普及,掷布鲁也成了各种运动会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项目。

家乡库伦是有着三百多年厚重历史的文化名镇,也是实行政教合一特殊体制的旗县之一,“国字”名片有五张之多。沙漠旅游,每年接待数以千计的游客,勤劳淳朴的库伦儿女发扬战天斗地、自强不息的库伦精神,把小镇打造得美轮美奂,魅力无限,三大寺悠扬的钟声,舞动的年代红绸和洁白的养麦花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四海宾朋,布鲁也因为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而名声大振。

家园时空



▲开鲁县略图(二十世纪初30年代)



▲批复的建县奏折

开鲁建县名称来源

李洪彬

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,人们所居住地方的名称,背后都有其历史渊源,都能道出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在北纬43度至44度、东经121度至122度之间,地图上的区域标有“开鲁县”三个字。如果溯其建县命名本意,“开”是指开垦、开发,“鲁”是指东鲁、西鲁、鲁特、阿鲁科尔沁这三个“鲁旗”共管之地,合起来就是开垦或者开发“三鲁”地区的意思。

清朝末年,在塞北边地垦务开办之前,这片蛮荒之地多是沙漠草场,另杂有一些杨、柳、榆自然生长树木,曾先后为东胡、鲜卑、靺鞨、契丹、蒙古等少数民族游牧之区。根据《蒙古游牧记》等有关资料记述,南北朝时期在西辽河及其上游西拉木伦河一带,出现了契丹部落。他们最初以青牛白马为“图腾”,后形成八部。关于契丹的起源,《辽史》中一段很有趣的叙述,“相传有神人乘白马,自白马山浮土河而东。有天女驾青牛车,渐由平地松林泛漠河而下,至木叶山二水合流,相遇为配偶后生有八子。其后族属渐盛,分为八部”。这里所说的土河,即老哈河;漠河,即西拉木伦河和西辽河的古称,位于现今开鲁县麦新镇南。上述足以证明这一代是契丹的发祥地。

金灭辽后,仍袭用了辽制,汲取其文化习俗的精华。后迁都燕京,将临潢府划归北京路。在金时期,此地均为临潢府所辖。自元朝忽必烈拓土开疆定鼎中原及以后的数百年间,此地皆属昭乌达盟赤峰县所辖。到清朝末年,设置热河都统,这时又划归热河辖境,仍由赤峰县辖治。

清光绪二十九年(公元1903年)。热河前都统锡良曾以“热河州县辖治动辄数百里,非添官不能兼顾”等现实情况,奏添一府(赤峰府)二县(开鲁县、林西县)。奏折上呈两年后,也无音讯。于是现任热河都统廷杰与东鲁、西鲁、阿鲁科尔沁三个旗的王公木柴、林沁洛依布、巴哈尔吉哩弟洽商,决定设立三旗开垦局。遣派钟元(字甸岑)为垦务总办,开放三旗蒙荒屯垦地方。

“塔甸地方”就是“三旗”蒙荒开放的代名词,蒙古语叫“塔林苏布鲁嘎”。也就是说有一座白塔周围,竟是低洼平坦的地方之意。沃地中华,幅员辽阔。数千年来,早已融合了民族之间各具特色的风俗和文化。至今民间还能听到“元建佛塔宋修庙”的传说。这座用大青砖砌筑的古塔,据考证它是建于公元1287年至1297年间。塔体通高17.7米,多级组成方形塔座,塔身为覆钵体,内空外圆,四面各有佛龛,塔顶为八角,塔身十三层。自上而下,逐层收缩,塔刹成半圆型圆盘上托起复式葫芦形宝瓶。虽说是经历700多年风霜雨雪的洗礼,承受着来自天灾人祸的侵扰,仍屹立不倒,劲秀挺拔。酷似利剑指天。

关于“白塔”的来历,有民间传说,修建白塔与王子溺水有关。相传在很久以前,这里曾有一座部落城池。部落首领有个十五六岁的小儿子,特别喜欢打猎。有一次,小王子带着随从进入一片湿地打猎,追捕一只白兔时,不慎坠入泥塘溺水身亡。部落首领悲痛欲绝,为纪念爱子,调动全部人力填平泥塘,并请来能工巧匠烧制大青砖修建佛塔。后来,蒙古族牧民在此放牧,称此地为“塔林苏布鲁嘎”(塔甸子),白塔因此得名。

还有的说:白塔的诞生,是为了降妖除魔。起初白塔附近是一片平坦的草滩,人们习惯地称它塔甸子。据说很久以前,塔甸子却是碧波粼粼的淖尔,地广人稀,草木繁茂,真是天然的好牧场。落下的天鹞就再也想不开,是被淖尔里的绿水迷住,游来的黄羊就再也不想离开了,是被淖尔旁的青草恋住。就连那南飞北归的群雁,也愿意在此歇脚落脚。

说来也巧,有个叫莎仁的牧女,常在淖尔边上放羊。她特别喜欢淖尔的水,更喜欢淖尔边上的那块卧牛石。淖尔的水,水晶般的光亮,莎仁的辫子像柳丝一样长,她每天都坐在卧牛石上梳头,蘸着淖尔里的那绚丽的霞光,淖尔里的水,月光般透明,莎仁的眼睛像闪闪的星,她每天都在卧牛石上唱歌,水灵灵的回音回荡草甸。这块卧牛石,还是莎仁同牧马青年朝鲁定情约会的地方。

有一天,响晴天空突然下了一阵急雨。水晶般光亮的水暗了,月光般透明的水浑了,花蜜般甘甜的水苦了,百灵般欢乐的莎仁愣了。原来北海独角龙的小儿子独角怪,随着迷离的雾雨来到塔甸子,给草原带来了灾难。独角怪对莎仁彬彬有礼地说:“烧过的牛粪竟还能起火,死去的心今天竟又复活了。姑娘啊!我的心灵已成了你的俘虏。”莎仁听后,回答独角怪说:“彩线的荷包只绣一个,姑娘的诚心只有一颗,牧女的爱已给了牧马青年,陌生的人且莫轻狂胡作!”

莎仁一扭头走开了,独角怪一跺脚生气了:“再过十天我要迎娶,四月十五就是正日子,你若不来,一场大水把塔甸子淹没,让你再也见不到牧群和绿草!”

牧马青年朝鲁和莎仁为保护家园,前往罕山寻得宝剑和石盘等降妖法宝,在与独角怪战斗中,

众人合力击败妖魔。莎仁用石盘压住独角怪,石盘化作塔基,宝剑化作白塔,清波荡漾的淖尔也化作绿茵茵的草甸,白塔由此成为守护草原的象征。

这些传说虽情节不同,但都体现了白塔与当地历史文化,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紧密相连,也在这座老建筑增添了神秘的色彩。它是十三世纪我国北方民族文化逐渐强盛的历史见证;也成为后来开鲁建县后的一个重要标志。

清朝末期,在“强邻逼处,窥我边疆,外患日棘,时局艰虞”的形势下,清政府相应地实行了旨在维护其封建统治,而加强边防移民实边政策,按照“边地之建置,重在防外,故必有官吏而后可以系人民,有人民而后可以辟地,有地力而后可以固边防”的思想方针,采取了“鼓励农耕,开辟蒙地,廉价放荒”的具体措施后,遂有山东、河北、辽宁、吉林等地回汉满等民族,因在原籍人多地少,或遭受自然灾害,闯关东后迁到此地落户开荒种地。据传说,有一个叫王大拿的大户人家,带着银两家眷及伙计十多口子,赶着四套马的钢轴车,从河北省的乐亭县出发,打算投奔塔甸子北边一百里地外的舅舅家。当路过塔甸子时,正值六月连天大雨,道路难走车马陷入泥潭。无奈之下,就在周围高岗处搭了个简易窝棚,雨过天晴之后,王大拿放眼望去,竟是郁郁葱葱的一块平坦草地,当即决断在此落脚。他叫伙计们卸下车上的犁杖,找了一块平坦之地深耕,种上了白菜、萝卜、芥菜、黍子等,没想到秋后得个好收成。王大拿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和生活方式,渐渐地,此地定居的人群越来越多,形成了各族人民共同生活、多民族杂居的格局。

垦务兴办,移民聚集。当时从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”角度看,有它的积极一面,但也产生游牧和农耕之间的矛盾,加之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,导致私开私放,蒙佃与民佃摩擦不断,打官司告状的民事纠纷逐渐增多,使垦务局应接不暇,置县添官已势在必行。

都统廷杰于光绪三十三年(公元1907年)十二月十四日将放垦概况,设县添官利弊,以及拟设县境范围、境内山川扼塞、道路险要、设城基址等各项事宜,一并再次上报,呈上《热河新开蒙旗各地添设州县等缺以资治理而固边防》一册。奏折提到:垦务初兴,佃户聚集,蒙佃与民佃杂处,讼案滋繁,若非设官维持,窃恐良民无以为依,奸民因而得计。万一匪

患潜滋,于垦政、边防均有关系,盖欲殖民已固,必先设官以为民,否则利少害多,民将裹足也。”此折经军机处抄交呈上审定,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准期所奏,并责成政务处妥办。军机大臣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亲王奕劻等则奉旨于光绪三十四年(公元1908年)二月十五日召集朱批会议。政务处会议上,将前都统锡良和现任都统廷杰的奏章慎重审议,以“近则垦务日繁,旗务日繁,蒙汉杂居,尤应酌增员缺,以资治理”和“既经该都统审度形势,妥善布置,自系因地制宜”的理由,批复了其添设州县的请奏。遂向皇太后、皇上覆旨。呈上《政务处议覆廷杰奏蒙旗地方添设州县由》一折,覆陈仰祈圣鉴。

按照《政务处议覆廷杰蒙旗地方添设州县由》所奏,光绪三十四年,在原来三个“鲁旗”王公治商设立的开垦局界上,正式添置一县——开鲁县。当时的县境边界,东西长约150公里,南北宽三十公里。其县所居具体地理位置是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在县内西部流经,全县绝大部分土地都坐落在两河交汇的西辽河上游北岸。东与巴林左旗(后来的通辽县)毗邻,西与翁牛特旗接壤,南与奈曼旗为邻,北与扎鲁特旗接壤,另外还有部分地区分别与科左中旗、科左后旗、阿鲁科尔沁旗连片。

开鲁建县之初的土筑城墙五六尺高,外面有一护城壕,大约一里多长。当时全县仅四百户,人口约3000人,其中县城居民约一百五十户。设有县衙一所,管狱一所,城隍庙一大间,塔侧营房一所。“三个衙门”(县署、管狱、营房)一座殿(城隍殿),土地老爷陪知县,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。钟元(字甸岑)为开鲁县第一任知县,并继续兼任三旗垦务总办。

勿忘历史,展望未来。开鲁县的历史,是一部从边疆荒地到现代化农业强县的奋斗史。屈指算来,从1908年至2025年,开鲁建县的历史已有117年。其发展历程体现出了一个民族融合、政策推动与地方特色的有机整体。回顾这百年沧桑的历史沿革,经历了社会动荡、行政变迁、政权更迭、社会建设、经济转型、行政调整等各个要素环节。从中折射出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,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”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,告诫人们“知史爱党,知史爱国,知史爱家乡”。现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,开鲁县的各项事业兴旺发达,这里的人民安居乐业,幸福安康。